

温故

王鼎钧 文学江湖：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郑凯梅 身历朝战与越战：一位美军退役上校的讲述
秦宝雄 往事杂忆：与宋恩荣谈晏阳初先生

温故

「三十二」

刘瑞琳 主编

苏 风 边缘生命
祝万安 我的求学生涯
方子奋 亡友马春晖
钟文典 国联防疫团在广西：法国穆克瑞博士的影像记录
蔡登山 文廷式的革职与脱险
岑燮钧 章太炎笑傲袁世凯
魏邦良 周作人与胡适：和而不同
周 言 《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
谢泳等 民国小学生、中学生作文选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二十二) / 刘瑞琳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95-1709-1

I. ①温…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72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曹凌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 作: 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0千字 图片: 55幅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特 稿

王鼎钧 文学江湖：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_ 1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后，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仿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 1952 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文协”摆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的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秦宝雄 往事杂忆：与宋恩荣谈晏阳初先生 _ 16

晏先生亲身从事乡村建设，在中国实干了三十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又实干了四十年，誉满全球，被公认为是世界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之父。我在谷歌搜寻关于晏先生的材料，他在国内的声誉（六十七万条）实在是太低了。我们细看他的一生，也许可以知道是什么道理。

记 忆

郑凯梅 身历朝战与越战：一位美军退役上校的讲述 _ 37

郑 菁

西点军校的生活十分严格，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铃就响了，我们跳起来跑到了宫房外面集合，按传统队列排好，点名。然后大家跑回去洗澡刮脸，再排队去吃饭。每天晚上实行熄灯制度。我们行动受到限制，一直到四年级才允许离开学校。

苏 凤 边缘生命 _ 65

我生于 50 年代初，在湄公河畔南越的鱼米之乡——西贡，我母亲的出生地。我的父亲是道地中国血统的福建同安县人。父亲很少和我说从前，也很少和孩子们沟通说话，孩子也没有什么发言的机会，但父亲有时会自个高兴地唱歌，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地唱歌。

祝万安 我的求学生涯 _ 82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重庆成了陪都，大批“下江人”来到重庆，一向平静的山城，突然热闹起来，外地学生也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学生是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和社会名流的子女。他们大多进入广益、清华和南开中学读书。我是 1940 年考上广益的，正好与不少贵族子女同学同班，有的还成了我的好朋友。

方子奋 亡友马春晖 _ 112

彭建成 曾经的军中精英老龚 _ 175

影 像

钟文典 国联防疫团在广西：法国穆克瑞博士的影像记录 _ 135
邹方霖

国联防疫团的专家来到广西以后，在倾力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对广西的山水田园、民情习俗和城乡风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喜欢游历和摄影的穆克瑞博士，或收集，或用手中的照相机拍摄了包括南宁水灾、日机轰炸梧州、民兵军训、中越边贸在内的诸多重大事件与民间活动，为我们了解战时的广西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人 物

赵曰茂 张士珩与神尾光臣 _ 179

蔡登山 文廷式的革职与脱险 _ 186

岑燮钧 章太炎笑傲袁世凯 _ 194

魏邦良 周作人与胡适：和而不同 _ 200

胡适和周作人，性格不同，志趣不同，人生的道路也不同；政治上有分歧，学术上有纷争，生活上也不免有齟齬，但两人的友谊却从未中断。根本原因在于两人都是伏尔泰的信徒：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尊重你发出的声音。

周 言 《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 _ 213

虽然陈寅恪是一个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甚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其在处事方面而言，不时透露出现代社会公民的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陈寅恪骨子里自家族一脉传承的士大夫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相交汇，成为了一种极具精神魅力的道德品格。

肖伊绯 天地一沙鸥：程曦与《燕园梦》杂剧琐议 _ 224

文 本

谢 泳 民国小学生、中学生作文选编 _ 230
何 洁

在这里天真是第一位的，小学生没有了这个东西，是写不好文章的。对中学生来说，虽然要求可能会高一些，比如要求他们能讲出道理和具备较丰富的知识，但“真实”这个要求始终不能放弃。

文学江湖：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王鼎钧

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

胡适 1949 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1952 年 11 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1954 年 2 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1958 年 4 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1 年 2 月去世。由 1952 到 1962 年，这十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做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写作的人提起胡适，首先想到文学。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50 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什么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众声喧哗的诱惑，抵抗新闻记者的挖掘。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余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1952 年，胡适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

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着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终于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地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台湾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爱玲了。

1958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后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这番话倒没引起任何争议，不过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我倒是暗中纳闷，当年左翼作家打造意识形态，帮助中共发展，结果如此如此，他是怎样看待那一段历史的呢？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讲话……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我想起他在北大授课的时候，走下讲台，亲手关上教室的一扇窗子，以免窗下的女同学着凉。

当时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桩，举此一例说明人没有尊严，他也太轻视劳动服务了，那些逼人投水上吊的花样为什么不说不呢？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后，胡适有一次讲话，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

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鲁迅和周作人创作有成就，他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1959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做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1959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着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后节目部主任邱楠带着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后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幻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我在旁担任纪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后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后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唯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于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

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地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难为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彩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会后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衷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着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划，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 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度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 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 Plot？字典上说 Plot 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于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 Plot 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我后来知道 Plot 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 Plots，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 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于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然后《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选择版本是编审大事，选派角色是演播大事，林黛玉一角最受瞩目，白茜如和徐谦都是头牌青衣，互不相让，我认为白茜如声音宽厚，可以反映薛宝钗的性情气质，徐谦声音尖亮，才是林黛玉的人选。最后由听众投票决定，选票印在《中广通讯》上，这是节目部的宣传刊物，对外发行。名角各有群众，刊

物抢购一空，统计两人票数，白茜如演林黛玉，徐谦演薛宝钗。“粉丝”投票，各为其主，艺术的考虑当然抛在一旁，至于五大顾问，会也开过了，照片也拍过了，新闻也发过了，也就顾而不问了。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后，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仿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1952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摆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的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我现在手边还有作家、名记者杨蔚的结婚启事，画家、小说家王蓝为他家老太太举行追思礼拜的通知，作家刘枋、朱白水主催联谊活动的公告，都是白话文。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给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信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某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后的阵地，白话文何时能攻陷这座堡垒，才算竟其全功。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

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后来丁进“中广公司”主持猜谜晚会,才成为大明星。胡适的演讲录音大部分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投身广播, 见证一页古早史

我应该是在 1950 年 9 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 9 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总统”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 1949 年 3 月引退,1950 年复位,1951 年 3 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 1951 年 1 月或 2 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介石“总统”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

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纪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也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也不能处罚。

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用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台、东北四台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唯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

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唯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台湾台的台长是工程师姚善辉，下设工程科、总务科、节目科，节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闻科，还有一个资料室，事实上播音和新闻都是节目工作，资料是为节目服务的，可是单从名称看不出组织系统来。我进电台的时候，省籍名人翁炳荣统率节目部门，增设编撰科。1951年3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给他的名义是节目总编导，统摄新闻编撰、播音资料各科。不久台湾广播电台撤销，业务由“中国广播公司”直营，分设工程部、节目部、总务部，原台长姚善辉任工程部主任，原节目总编导邱楠任节目部主任。节目科升格为部，空间扩大，层级增多，下面设编审组、新闻组、播音组、资料组，眉目就清楚了。

那时无线电广播是新闻事业的尖端，却也是工程设备的幼年，但是对于我，一切都非常新奇。发音室冷气昼夜开放，为了使声音合乎标准，室内铺着很厚的地毯，挂着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镶成，内外两层，里面一层微微倾斜，以减少回音，伺候声音像伺候皇后。第一代录音机体积笨重，使用钢丝录音，必须由工程人员操作，节目人员使用录音机，必须工程部门批准，太尊贵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声音反复重现，人定胜天，本是二次大战中研发的秘密武器，

岂可视为等闲！唱片还是胶质，速度七十八转，有些沙声，硬脆易碎，怕压怕碰怕摔，那可是进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张唱片已是厚礼，电台唱片整箱整柜，工友经常捧着厚厚一叠上楼下楼。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每天写的文字都会变成声音，四方各地都有人专心收听，怎么可能？居然可能！

那时“中国广播公司”有全国知名的工程师冯简，据说机器故障播音中断的时候，他能坐在家中用电话指挥修复，无须亲临检查。南京时代有名的男播音梁栖，方面大耳，音质浓厚，播送政论文稿以声服人，走出发音室的时候满身大汗。重庆时代的女播音员刘若熙，美人迟暮，改调编辑，当年号称“重庆之莺”，与日本的“东京玫瑰”争鸣。想那1928年，全国没多少人见过收音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广公司”的前身）训练了一批收音员，他们带着收音机前往各省，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讲，纪录缮印，送到当地报馆发表，同时也制作壁报供大众阅览，当年的收音员，还有几位在“中广公司”担任行政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光辉岁月中遗留的人物，后进置身其间，很能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资料室从南京带来一批图书，话剧剧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深、郭沫若、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战胜利以前，这些人是左翼作家，这些书是禁书，“中广”把它们运到台湾，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剧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铅笔勾点批注，哪个角色由哪个人演，哪个地方加入分场的音乐，分明是电台导播的作业，敢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使用这些剧本！我仿佛看见一群播音员挤在麦克风前伸长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书播出节目，那时节目制作如此因陋就简！今天严厉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国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见肘！算得上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国际宣传的教父，英美新闻界外交界的老朋友，为“中广”争取许多美援。他惯用英文批签呈，无为而治，一律OK，我从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符号。有一次节目部签办一件事，送工程部会签，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见，董总批示OK。节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联名再签，问总经理究竟OK了谁的意见，批示下来仍是OK。他娴熟国际社交礼

仪，每天服装整齐，见了女同事就鞠躬，对我而言，新奇！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是张道藩，“党国要人”，“领导国民政府的文艺运动”。他的作风不同，那时宣传政策由中央宣传部掌握，他轻易不说什么，倒是对行政事务的细节很注意监督。记得当年到新公园游览的人，往往沿着那条水泥小径误入电台，“总务部”特地在电台入口处左右竖立两根方形的柱子，示意这是电台的大门，又在右边柱子上制作“中国广播公司”大字招牌。张道公看见建造费用的账单，认为贵得离了谱，把负责人叫来“骂”了一顿。他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邮票，办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车，对我而言也是新奇。

那时台湾电台的待遇很低，我调到编撰科以后，资料室添补新手，有一位小姐应征，她听见月薪只有两百二十元，变色而去，临别留言：“苏俄用农奴工奴，你们这里用女奴！”王大空任广播记者，工作表现优异，言谈诙谐有趣，有时却也愤然自语：“‘中广’！你有本事就饿死我！”只有我很满足，薪水加上稿费，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计划如何迎养寄居台中的父亲。

那时兰陵王氏子弟多人从上海随上校爷爷撤退来台，分散在联勤各单位当兵，放假的日子，他们想到台北市逛逛大街，没钱买车票，没钱吃午饭，希望我接待。我到上海的那个把月，他们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我追慕上校爷爷县长爷爷的风范，不计前嫌，他们来找我，我奉上新台币二十元，天热可以吃红豆冰，口渴可以喝黑松汽水，饿了可以吃山东大馒头。那几年，我怎么也存不下一块钱。

台湾电台的外观优雅，看资料，这栋建筑由日本人栗山俊一设计，采用日本30年代流行的“帝国冠帽式建筑”，想当初是一栋漂亮的建筑。它位于公园一角，那占地七百一十五亩的绿地热带树林、露天音乐台、拱桥池塘（后来又有满园杜鹃花），仿佛是它的庭院。我们在楼上写稿，那时办公室尚未禁烟，同事作家骆仁逸常常把手臂伸到窗外“弹”掉烟灰，他说“我拿整座公园当烟灰缸”。日本把电台、法院、银行、外交宾馆都设在总督府周围，据说是表示对广播十分重视，电台虽在闹市中心，有了公园，也就闹中取静，躲掉多少尘嚣。“陈素卿殉情案”的男主角本是这家广播电台的编辑，殉情案发生后，女主角

在感人至深的“遗书”中说，她常坐在公园喷水池边长椅上偷看男主角上班，我们读了遗书，也曾结伴来到新公园，坐在陈素卿坐过的地方瞻望这座小楼，那时我曾设想，谁能在这座小楼里办公真是一种幸福。我怎能知道它内部的诡谲骚动与外观的宁静幽雅恰成反比。

我听到老前辈讲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广公司”接收了这座电台，可是没办好产权转移。有人提醒经办人：现在实行“宪政”，有一天国民党不再执政，若是产权有问题，你就不能再使用这座房子了！那人听了大笑，他说怎么会有那一天！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本土意识高涨，还没等到政党轮替，房产就还给市政府了。

我由资料员调成编撰，座位靠近玻璃窗，凭窗下望，可以看见一条水泥小径由“总统府”前的大道分支，通往公园的出入口，看见少男少女一对恋人手牵手走过，看见新婚夫妇抱着小孩相互扶持走过，看见中年夫妻彼此保持三英尺的距离、孩子跟在后面走过。日复一日，听见仪队在“总统府”前奏乐降旗，年复一年，双十节，听见蒋介石“总统”在“总统府”前、公园旁边的广场阅兵。双十节本来放假，“中广”伺候“总统”的阅兵实况和国庆文告，节目工程的骨干人员照样上班，而且精神特别紧张。阅兵的时段内，公司大门外站着宪兵，楼上办公室站着穿中山装的内卫，玻璃窗关紧，我们都不可走近窗口。公司楼顶平台上由防空部队据守，架好高射机关枪。新奇之中隐隐有一丝恐惧。

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可以脱去一层皮，换上一张脸，小心谨慎做个新人。

1951年我调任编撰以后，“中国广播公司”尽力做政治宣传，当时的说法是“巩固领导中心”，“唤起同舟一命的危机感”，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节目内容时时宣扬蒋介石“总统”的伟大英明，国民党的历史光荣，时时抨击共产党革命谋略之诡异，统治手法之狠辣。1953年，“中广”秉承中央党部旨意，负责制作“全国电台联播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播出（星期天延长到九点），“中广”发音，二十一家公营和民营电台同时转播，加紧“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政治宣传节目的收听率很低，制作节目的人没有社会声望，节目的内容敏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言丧身，一字倾家，制作节目的风险很高，工作

当前，人人缩手。他们欺我年轻新进，把这样重要的使命交给我这个资历最浅、待遇最低的人，我那时还有大头兵思想，任务分派下来，冒险犯难要去完成，听天由命也要去完成。我背后没有大官，左右没有帮派，袋中没有文凭，脑子里没有天才，每天以“傻小子”的姿态横冲直撞，跻人节目部的“三张王牌”，与王玫、王大空并列。

这个工作我做了许多年，积累了许多“没有用的经验”，但是经验可以转化，我的写作倒也因此有些长进。那时党方官方认为宣传就是“自外打进”，就是重复灌输，每一个政治主题都有陈腔滥调，可以反复使用，我曾告诉朋友：“只要学会五百句话就可以吃宣传饭。”那时每逢节日庆典，县市首长都要发表“告全县同胞书”，都在庆祝大会上演讲，秘书从档案里找出旧稿，稍加斟酌，县长拿去照念一遍。那时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未久，他们脑子里还存着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成真理”，他们没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

我那时年轻，不甘墨守成规，竟以在“小说组”修习所得，认为节目的宗旨不能变、技术可以变，主体不能变、角度可以变，内容不能变、修辞可以变。我拿政治节目做我的练习簿，小心实验。“蒋总统”“河山并寿日月同光”不能改变，“万寿无疆”不敢更换，每年此日我看会场和大街，看这四个字的大标语，它们的字体和颜色也年年照旧，远洋轮船沿着人家走过的航道行驶最安全。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改，逢到植树节、青年节、体育节，我更可以放手放胆。我本来食古不化，小说组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鼎公”，几年下来，我的作文渐渐化难为易，化古为今，化单调为多样，化严肃为平易。

大约是主办政治宣传的缘故，我常常看到“限阅”的文件。限阅是机密和公开之间的一个分类，这些文件可以给许多人看，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看，那年代新书难寻，报道评论千篇一律，这些文件别有洞天，对我的进境也有帮助。1952年10月我读到一篇“奇文”，蒋介石“总统”主张用“爱”反共，他的训词里面有这样的警句：“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也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他说：“我们今日要召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提振我们爱的精神，以伦理为出发点，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而至于

邻里乡土之情，民族国家之爱，以提高国民对国对家对人对己的责任”。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

我大吃一惊。1952年，正是蒋公“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的时候，正是他的心腹股肱高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时候，正是“仇匪恨匪”渐成军中教育主轴的时候，蒋公他老人家居然还有这个境界，这表示蒋公心中确有基督信仰（当然他并非“只有”基督信仰）。恰巧《广播杂志》催我写稿，我马上写了一篇《爱的宣传》表示响应，并加诠释。我说反共“要把人民受宰制的痛苦和大多数干部受里胁驱策的痛苦联在一起，想办法一齐解除，这就是爱，这就是悲天悯人。”我二十几岁能有这般见解，分明也出自基督教的熏陶。总编辑匡文炳看了我的文稿，沉吟有顷，他把训词原件要去查验了，然后发排。11月6日杂志出版，我打开一看，我的“回声”居然放在第一页社论的位置。

我觉得蒋公这篇训词非常重要，今天国民党力倡台湾和大陆和解共生，当年“爱”的训词更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基础。可是这篇训词当时无人转载，无人响应，后来无人引用，各种版本的蒋公言论集都没有收入，“爱的训词”究竟何时何地对他等人所发？我问过研究蒋总裁思想言行的专家，他也说不出话来。这篇训词竟然成了我的奇遇。

还有一些“无用的经验”终归无用，而今成了茶余酒后的笑谈，也算是“无用之用”了。50年代（还可以加上60、70年代），台湾的重大庆典都在10月：10月10日，双十节。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蒋介石“总统”诞辰。每一个日子都要高质量宣传，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整个10月都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偏偏定在10月1日！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10月1日这天（甚至前一天）台湾媒体不能有任何喜乐庆贺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不可开张剪彩，不可花落花开，不可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巾蒙头，台湾10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节目气氛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兴奋热烈，工作人员在心理上总有戒慎恐惧强颜欢笑的感觉，